

市镇绅商与地方教育近代化转型

——以南浔镇为中心

郑卫荣

【摘要】：市镇绅商是地方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原动力”。十九世纪末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传统旧学教育体系变革的基础上，近代南浔镇的新学教育形成了“官办民助”“官倡民办”和“民间自办”三种模式多元发展、动态消长的格局。绅商在不同阶段、不同模式中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活跃度，在地方新学教育体系中占据着相对顶端的位置，维系着近代新学与经济资本、文化教育、思想启蒙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发生与发展，成为地方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启动者、主导者，也是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成长为地方教育主体力量的助推者。

【关键词】：绅商 教育 近代化 南浔镇

作者郑卫荣，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温州 325035）

教育近代化是一个趋势性、过程性的概念，是指在近代西学教育模式的影响下，以科举功名为标志的，以书院、私塾等机构为场所，以儒家经典学说及其伦理纲常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旧学教育体系，通过历次革新，逐步转向以新式学历为标志的、以新式学堂为场所，以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与社会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新学教育体系。两个体系的转变过程，既体现在教育制度、内容、手段和方法等物化层面，也反映在教育观念、文化思想、社会心理等精神层面。^①教育近代化转型中，新学教育体系并非一日建成，旧学教育体系不会迅速消逝，而是两者同时并存、交锋对垒，构成了新旧交织、由旧趋新的态势。在近代江南地区，市镇绅商阶层通常主导着地方教育近代化的转型。近代南浔绅商创办和参与地方教育的动态进程，为我们考察近代市镇地方教育的新旧嬗递以及蕴含其中的教育近代化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分析样本。

一、转型前夕的传统旧学教育体系

在传统旧学教育体系中，政府设立的官学系统（包括国学、府州县学）、书院系统和民间创办的私学系统（包括家塾、族塾等形式）相辅而行，共同承担着知识教学、道德教化以及造就科举人才等职责。明清时期，由于官学数量较少且容积有限，对市镇乡村民众教育的任务主要落在地方社学、乡约、书院、义塾和民间私塾等基层教育机构上。依次而言：

社学、乡约。明清时期，乌程县知县办社学、举乡约，于各乡都分别设置五所。南浔设社学、乡约各一处。^②其中，社学“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内有志学文者，俱令入学肄业”，“务期启发童蒙，成就后人，以备三代党庠、术序之法”；乡约则“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并推举乡人善行过失、记入册籍。^③从明万历朝时湖州知府陈幼学“恒到镇举乡约”、清光绪朝时湖州知府丁鹤年“每督饬县绅宣讲乡约”等纪录来看，乡约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④

书院为“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讲习”之所。南浔镇书院始于清咸丰庚申—辛酉年（1860—1861）间的“南林会课”。太平天国兵燹后，清廷于同治四年（1865年）恢复科举考试。镇绅朱宝书、温鼎、庞正庄、沈镜漪等人谒郡邑尊，公禀兴建浔溪书院，蒙即批准。^⑤次年，乌程县令萧书“倡捐廉俸二百缗”，湖州知府杨荣绪、宗源翰“复鼓舞而振兴之”，加之本镇丝捐项下拨款三

千余缗以及镇绅助地，遂于同治九年（1870年）建成讲堂三楹、精舍三楹，后又“经绅董公禀，请拨湖郡善后丝捐款存典生息为膏火资，规模乃备”。书院落成后，南浔一域“考校有期，讲肄有地，分给膏火有定程，士气文风于兹复振”。相较社学、乡约，书院教育以“兴贤育才”为要义，在于养人才而又扶名教；在教学上以讲贯经学、史学、治术诸书以及对偶、声律之学为主要内容，以“考课”为主要形式，“每月朔望两课，每年二十课，其甄别请知府课试，又请府县官课二次，著为常例”。^⑧书院教育受众较少且知识程度较深，侧重于为科举士子提供专门的课试训练。

义塾之设专济孤寒。南浔义塾初创于明嘉靖年间，重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设分塾于南、北、西三栅，由丝业捐银二千元存典生息为经常费，至光绪末年逐渐废止。^⑨义塾公举“品学兼裕、老成耐劳者”为塾师，由湖州府考定、送关聘请；又由湖州府“设义塾总董一人，专司稽查塾师之勤惰、生徒之良莠、经管董事之认真与否，其惰者、莠者、不认真者均准总董禀府更易”。义塾“清晨读书、午后习字，塾师讲书义数通，各生徒固须通晓文理，而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尤须多方辟喻”。^⑩

社学、乡约、书院、义塾作为具有官方色彩的地方教育机构，在师资遴选、教育管理、绩效考核等方面接受官府监督，辅助官方在地方开展知识教育和道德教化。而私塾（包括坐馆、家塾、族塾等多种形式）则是传统社会固有的非官方私学机构，大多由地方民众自行设置、自主运行，承担着地方社会适龄学童教育的重要功能。以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通令私塾改良均应按奏定初等小学堂简易课程办理为界限，前期私塾以教读“四书”“五经”、学习作文、制科文字（八股文）为主要内容，后期则依循《改良私塾章程》（1910年）调整课程、教材、教法，逐步向近代小学过渡。改良私塾虽然迭遭新学排挤，但仍以设置简易、人数不限、个别教学等优点而长期存续。时至1932年，南浔镇尚有尊经、益勤、茗东、汉英等私塾9所；除2所私塾塾师姓名不详、2所私塾学生数不详外，共有塾师7人、塾生161人，^⑪分别占当时全镇小学、小学教职员和小学生数的32.1%、8.0%、6.8%。^⑫私塾教育的顽强韧性，隐含着传统旧学教育模式所具有的乡土适应性，也预示着新旧二元结构中新学教育发展之艰难。

明清时期，上述地方教育机构在普及乡村教育、维护社会教化方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延续至清代中后期，其实际成效每况愈下。即使是官府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的社学、乡约、书院等机构，不仅在科举应试上无法普及生童教育进而培养更多的科举后备人才，而且在社会思想控制、道德风俗教化上也面临着“近效难收”的尴尬。^⑬时代演进至清末，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传统的文化秩序受到新知冲击，社会阶层的变动也在根本上对既存的文化教育格局展开了重塑。

二、三种兴学模式：“官办民助”“官倡民办”“民间自办”

十九世纪末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革期，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及抗战爆发，近代社会在极短时间内迭次出现政治观念、思想文化取向的转换，在新学教育中表现为制度、目标、计划的多变与调整。在此期间，近代南浔新学教育大致形成了“官办民助”“官倡民办”和“民间自办”三种模式。

1. “官办民助”模式：以浔溪书院为代表

清末戊戌维新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主张变革科举制度，改八股为策论，效法泰西学规，开设经济特科等“新学”。虽然维新变法昙花一现，兴学运动也只在零星地区展开，但它却揭开了清末全国兴学潮流的序幕。在光绪戊戌当年，浔溪书院的改革并未立刻展开，“戊戌八月而后，书院课士仍用试帖制艺”。^⑭绅商刘锦藻、蒋锡绅、李惟奎等人认为书院“改八股为策论”为“大势所趋”，于是先“另设策论一课，膏奖从丰”并由“徐容斋邑候主持，得筹款项”；次年（1899年）春，刘锦藻“驰书请汤蛰仙（寿潜）同年主讲席。（汤）欣然惠临，开课后始去”。^⑮自此，浔溪书院在常课之外，“兼课经史、时务、策论”。经费则来自于本镇浚河捐每丝包捐洋三角中提取二角，为期三年。^⑯翌年（1900年），汤寿潜以事去职，蒋智由（字观云）代理山长一职，“更增声、光、化、电诸学”。改革后的浔溪书院“学风丕变，一洗空疏迂阔之习”。^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为培养各类实用人才而推行教育新政，参照日本学制系统、吸收西方教育理论以改造传统教育体系，九月，清廷发布上谕“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⑨在书院大规模改办学堂的风气下，浔溪书院于次年（1902年）合并明理学塾，“禀县定为两等小学堂。校长一人，中文教习二人，西文教习一人，舍监一人，庶务一人”，改制为地方第一所官办新学。^⑩首任校长闵次颜（字季望）“就书院存款下酌提二千金，于其东偏建南北向楼屋各三楹，楼下为教室，上为宿舍”。初创时期的浔溪两等小学堂在当时面临着“风气初开，校舍规制未经探讨，加以经费支绌，鸠工庀材诸多草率”等诸多困难，但作为当时镇上唯一一所两等小学堂，承继着近代地方教育的新旧嬗递，经由该校的“初小毕业生送入高小肄业者，岁辄加增”。^⑪及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教育普及社兴办的第一、第二初等小学成立，浔溪两等小学堂遂改为高等小学堂，作为前者之升阶学校。^⑫至此，改造后的传统旧学资源与新创的新学堂完成了学制序列上的前后对接。

从南林会课（1860-1871）到浔溪书院（1871-1902）、浔溪两等小学堂（1902-1908），再到后来的浔溪高等小学堂（1908-1913）、浔溪完全小学（1913-1928）和浔溪中心小学（1928-1936），浔溪书院的嬗变勾勒出传统旧学历经革新并逐步蜕变为新学的大致轮廓，构成了近代南浔新学发展的第一种类型：“官办民助”模式，即在地方官府的倡导下，通过改造原有书院等旧学资源，辅以官府捐税和地方绅富捐输，逐步嫁接新学资源，最终实现教育资源的脱陈出新。

2. “官倡民办”模式：以教育普及社为代表

从戊戌维新至1905年间，由于清廷通过变通科举制度来推行教育改革，社会各阶层恋栈科举而对新式学堂多持观望态度。新学教育在改书院为学堂之外大都是言多行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廷宣布立停科举，“明谕旨各督抚、学政切实督饬地方官劝谕绅士广设小学堂，裁节官中不急用之费，捐募绅富有力之家，通力合作，同时并举”。^⑬新学改革迅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同年12月，清政府设立学部以统辖全国学校教育，并于次年下令各省设提学使司，于省会地方设置学务公所，各厅州县于本城择地设劝学所统管全境学务。劝学所由本地人任总董和劝学员，职权上包括自筹办学经费、包揽地方一切学务。^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浙江省首届教育会在杭成立，各县奉令设立劝学所，总揽县教育行政，三年内相继成立劝学所76所，形成了以地方人士为主体，以教育会、劝学所等社团为依托的地方新学教育组织体系。^⑮在南浔镇，对接县劝学所并负责本镇新学筹划、组织和监管等职的机构是教育普及社，其成立时间早于省教育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张维熊、陆善同、金熙、张明良、温调孙等60余人创设教育普及社于南栅报国寺文昌阁。该社以“普及儿童教育”为宗旨，订定社章、筹办学校详细章程，拟定先办四栅初小四所、高小一所，再酌量扩充。同年冬，教育普及社及其章程，经浙抚张曾扬批准立案，并通飭各县仿办。^⑯

在兴办新式教育初期，由于“风气未开，地方人士多墨守旧法，故经费筹措甚难，计划无从实行”，教育普及社一方面禀呈上级官府争取拨款，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民间办学资源并加以改造，陆续创办了第一小学（1908）、第二小学（1908）、第三小学（1909）和第四小学（1909）。^⑰

在办学经费上，四所初小均为“就地筹款”，主要来自地方“商捐商办”的茶碗捐、禁烟税、茶捐、桑秧捐及惜字会捐款，其拨款方式为年拨或月拨。其中，以第一小学经费“茶碗捐约一千余缗”最为宽裕，“房屋宏敞，为镇上各学堂之冠”，^⑱而以第四小学最为局促，“经费仅取给西北惜字会余款，规模甚狭”。^⑲这种筹款方式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

在办学场地上，除第二小学为租赁民屋外，第一、三、四小学分别以慈荫庵、圆通庵、万善庵等庵庙改充校址，这些校址或经官府划拨或由庵庙捐助，均缘于清末庙产兴学的时代背景。1907年春，教育普及社呈报县府要求将镇上部分尼庵改设小学，次年经县批准，普及社接收万古庵、圆通庵、万善庵，陆续开办各初小。例如第一小学“就慈荫庵为之”。“先是庵僧犯戒律，镇人逐之”，^⑳后由“士绅朱景圻等以南浔教育普及社议办第一小学校有款无地，特电禀浙抚，请将该庵拨归学校”，浙抚着令“即日启封，以便修葺赶办”。^㉑该做法一直沿用于民元后第五、第十二等小学的建设。

在教学实施上,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后,小学教育内容一改过去独尊儒学而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设置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学、体操等课程,并按照“癸卯学制”执行修业年限。然而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新学堂“习气之不良、课程之欠善”,“许多中等人家宁送其子女入私塾而不愿入小学,财力稍厚者则延师于家以课其子弟;至送其子女入小学者,又先私立而后公立”。⁹此外,还普遍存在着学生程度高低不齐、教学进度快慢不一等问题。⁹这些因素制约着新学取信于民的普及过程。

综上,教育普及社兴办的 4 所初小代表了近代南浔新学发展的第二种类型:“官倡民办”模式,即以新学制为导向、在地方自治框架内以地方捐税及政府拨款为主要经费来源、辅以庙产助学、商办商捐的兴学模式。在该模式的影响下,地方各界逐渐形成了兴办新式教育的共识,办学活动也渐由自发性转向组织化和制度化。

3. “民间自办”模式:以私立新学为代表

清末兴学堂过程中,清政府意识到“仅恃地方官吏董率督催以谋教育普及,戛戛乎其难之也;势必上下相维,官绅相通,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地方学务乃能发达”。⁹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前后,浙江巡抚为倡办新学,数次申令筹办新学堂“惟事创始,筹款维艰,尚赖地方绅富集资捐办,以辅官力之不足”,并就本省绅富捐资兴学事项奏请量予奖励。⁹地方绅商以其优厚财力成为官府劝资的主要对象,顺势成为地方兴学的重要力量。在此时代背景下,由私人或民间团体出资创办的新学不断涌现,形成了近代南浔地方新学发展的第三种类型:“民间自办”模式。

以民国元年(1912 年)为分界,“民间自办”模式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清末至民元之前,民间自办新学有 5 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参与浔溪书院改革的李惟奎以“内外交江,育才孔亟,以私财创立明理学塾(1900-1902),为一邑倡”,学制相当于高等小学堂,聘请王文濡(字均卿)主持校务。这是乌程县首所、湖属各县第二所私立小学堂。⁹次年(1901 年),庞元澄独资创办浔溪公学(1901-1904),“规则一遵中学校”,¹⁰为县域首所私立中学,先后聘请叶翰、杜亚泉为总教习,选聘邵力子、周达等人开设国文、英文、日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等课,“四方来学者甚众”。¹¹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赴美考察归国后的张增熙发现“不少青年过去所学八股已不切实用,又因年龄较大,不适于进两等小学”,“为改造旧学计,遂设正蒙学塾(1903-1907)”,学制为两等小学堂,聘请曹砺金为主任,沈士远、沈尹默、彭周鼎等人为教员。¹²与此同时,张氏“又于宅后创设工艺厂,赁屋白鹇兜,设阅报设,……所识穷乏者,有志负笈游学,辄量予资助,有缓求急,罔不无应”。¹³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虞亚青、邱问清、张增熙等人有感于“南浔妇女近颇有志向学,惜无校舍”,遂联合庞青城、曹砺金、金熙、邱冰壶等人创立浔溪女学堂(1906-1908),招收女学生三十余人。¹⁴这是南浔第一所女子学堂,也是 1907 年学部宣布女学开禁之前的开创性尝试。女学堂聘请徐自华(字寄尘)为校长,次月,适逢留日学生风潮归国的秋瑾入校充任教员,教习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¹⁵1908 年,女学堂因受秋瑾起事失败牵连而关停。次年,由张明良、徐一冰、蒋冠群、张善植等人与上海爱国女校接洽,于浔溪女校原址改设上海爱国女校南浔分校(1909-1913),办校经费由上海总校拨付,地方助洋四百元。¹⁶

五所私学的创办正值清末学制调整的变动期,这些学堂的修业年限、所设课程和所聘教师在当时都无规范可循,授课内容大多自行设计,即使是办学条件最为优良的浔溪公学也不例外。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时任浔溪公学总教习的叶翰受庞元澄资助前往日本考察新学并购置学校仪器设备、教科书。在比较中日两国学务后,叶翰对新学管理的前途充满忧虑:“彼国主持学校者皆专门人才,且管理员资格在教员上。今中国乏此等人才,学生知识日进,而管理员以寡对众,即在专家犹虞不给,况吾国为管理者又皆典黉蒙馆先生,若何而可言教育?窃恐措置之难,首在乎是。”¹⁷次年夏天,叶翰因公学爆发退学风潮而请辞,由杜亚泉接任总教习。杜氏“不辞劳苦,悉心擘画,为学生参考计,实习计,辟图书、仪器二馆,又以传达文化特印刷物,劝庞君购置印机及铅字以备用”,尤为注重优选师资,“所请教员,均为一时知名之学者”。¹⁸然而即便如此,浔溪公学仍被学生指为“程度、制度不完”,“任事者不识甘苦,苛待学生”,¹⁹还面临着“经费不足”“班次不齐”“课程太繁”“专科教习不足”等诸多问题;身为总教习的杜亚泉甚至“兼授理化、算学、日文、文法等”,以至蔡元培“懼不足以持久”。²⁰是年 11 月,浔溪公学

再度爆发退学风潮，终以学生散学而关停。这其中，固然有当时学界思潮激进、学生躁动情绪使然的因素，却也与新学教育在制度设置、教师配备、教学计划等方面不适应时代需求且无法回应学生关切的事实有关。

诸如上述种种原因，五所私学均不及三五年而停辍，但私学的兴办还是对于宣传新学、开启民智、革除陋习起到了启蒙先锋的作用，推动了地方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尤其是浔溪女学堂的开办，冲破了《奏定学堂章程》（1904 年）禁办女学之规定，加之秋瑾在女学堂任教期间（1906 年 3 月至 7 月）的言传身教，南浔女界率先追崇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开展反对女子缠足、买卖妇女、虐待童养媳等反传统礼教斗争。据林黎元回忆：浔溪女学的金一之、沈馥亚、徐闵斯、沈仲庄等学生后来都成长为初小教师，在北伐前都是镇上著名的女校长。^⑨

第二个阶段：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各自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先后颁行“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壬戌学制”（1922）。与此同时，全国教育行政制度、省级和县级教育行政机构设置逐步规范、完善，《国民政府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浙江省捐资兴学褒奖规程》也陆续颁行。^⑩在官方政策推动下，绅商联合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南浔先后兴办了 10 所新式学堂，分别是 5 所小学堂：浔南女子小学（1912-1914）、第三女学（1913-1914）、儒葵会国民学校（1917-1929）、丝业小学（1917-？）、精勤学塾（1924-1926）；2 所初级中学：私立南浔初级中学（1925-1937）、私立南林初级中学（1925-1927）；1 所完全中学性质的讲习社：私立南浔国学讲习社（1935-1937）；1 所高小-初中并设学校：私立菁莪学社（1933-1937）；1 所大专学校：中国体操学校（1920-1924）。^⑪其中，儒葵会国民学校、丝业小学“经费充足、教师和设备齐全、教学质量较好”，是民国初年办学条件最好的两所私立小学；^⑫1920 年由上海搬迁至南浔的中国体操学校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培养体操专门人才的学校；私立南浔初级中学和南林初级中学是最早的两所镇办初中，构成了地方教育完整的中小学校体系。这些新学的创设和发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属六县的中小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⑬

三、三种模式的消长：地方学务近代化的轨迹分析

1. 三种模式的动态消长

以民国元年为时间分界，前述三种兴学模式的动态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民元之前，三种模式并存，而尤以“官倡民办”模式收效最为宏著。这一时期，以教育普及社为代表的“官倡民办”兴学力量，依托清末学务自治政策，对上承接县劝学所的机构职能，对下整合地方绅商、捐税捐款、庵庙场所等人力物力资源，在两年间接连兴办 4 所初级小学，快速占据了地方初小教育体系的中心位置。“官办民助”的浔溪书院以新学课程改革为先端，在官方学制系统改革的推力下，逐步完成由书院到新式小学堂的建制调整，最终实现与教育普及社主导的“官倡民办”初小体系的衔接。“民间自办”的 5 所私学，在时间上有 4 所早于教育普及社的成立，有 3 所早于 1904 年“癸卯学制”的颁行，在学制和类型上涉及两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女子学堂，与教育普及社主办的初等小学有所错位，也易于衔接。其中的明理学塾、浔溪公学、浔溪女学堂更是开启当时乌程县以及湖州府私学风气之先。相较而言，“民间自办”私学受学制调整的影响更甚于其他类型的新学，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在民元之后，根据 1912 年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小学校令》以及浙江省教育司《对于小学教育的办法》关于“初小、高小分别由城镇、县设立并负担经费”的原则，吴兴县政府设立教育局主持地方教育事业，将原先“官倡民办”的初级小学、“民间自办”的初级女学收归区立，转变为县、城镇“官办民助”的公立学校。“官倡民办”模式无以为继，教育普及社也无形解散。“民间自办”和“官办民助”持续发展，尤以后者成为主流模式。这一时期，在县教育局的组织和经费支持下，南浔镇陆续增设 8 所初级小学（第五至第十二小学），再加上民元之前已有的 4 所初级小学（第一至第四小学）和由浔溪高等小学堂改制而来的浔溪完全小学、浔溪中心小学，构成了普通小学教育体系的主体。随着“官办民助”模式的壮大，“民间自办”类学校呈现出向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专门学校等方向错位发展的态势，但日益受到市镇教育资源匮乏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来自近代新学体系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新学堂在区域层级上形成的“大学、高专（都市省会）-中学、师范（府治县城）-高

小（城镇）-初小（市镇乡村）”金字塔结构，构成了自上而下的文化支配结构，持续挤压着市镇教育的发展空间。清末至 1920 年代初，南浔大部分“高小毕业生送入郡城中学肄业”，其余则流向杭州、上海等邻近城市。^⑨1925 年私立南浔中学在建校初期的“艰难缔造、惨淡经营”，以及 1927 年在南浔办学的中国体操学校因招生和经费问题而停办，就与市镇发展初级中学和专门教育的资源匮乏不无关联。迨至 1930 年代，随着浙江省颁行《自治进行方案》，将“乡镇所在的地方教育的主要内容”规定为“根据县教育方案、地方教育实施计划，设立乡镇小学及民众学校，充实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各机关内容”，^⑩进一步限制了“民间自办”模式发展其他等级、类型私学的现实可能性。

2. 地方学务亲历者的群体嬗递

根据已有资料，整理两个阶段、三种兴学模式中的 47 位地方学务亲历者的信息（见附表），可知这一群体主要由绅商、士绅、商人和新式知识分子组成，并且呈现出由传统趋向近代的嬗递态势。对这一群体进行分析，见表 1。

表 1 地方学务亲历者的结构分析

类型	人数	创办者		参与者	
		人次	人均频次	人次	人均频次
地方学务亲历者	47	32	0.7	63	1.3
其中，秀才及以上功名者	34	24	0.7	47	1.4
其中，秀才	21	9	0.4	25	1.2
其中，贡生及以上	13	15	1.2	22	1.7
其中，绅商	15	21	1.4	9	0.6
其中，秀才	8	8	1.0	6	0.8
其中，贡生及以上	7	13	1.9	3	0.4

从整体上看，有资料可查的 47 人中，创办新学者（即独创或合创新学堂）有 32 人次、参与新学者（即担任新学堂校长或教员等职）有 63 人次，人均频次分别为 0.7 和 1.3。首先，从教育背景因素来看，47 人中，具有秀才及以上功名者 34 人，占总人数的 72.3%，共计创办新学者有 24 人次，参与新学者有 47 人次，分别占总数的 75.0% 和 74.6%，无论是从人数占比还是从活跃程度来看，都构成了地方新学力量的主体。其次，进一步比较 34 人中的秀才和贡生以上功名者，后者人数虽少，但以其优越的文化资本在学务中占据更为核心的位置，表现出更高的活动频次。再次，从身份背景因素来看，47 人中，具有绅商身份者 15 人，占总人数的 1/3 弱，但是占据了创办新学者人次总数的 2/3，其人均频次（1.4）为平均数（0.7）的 2 倍；与此同时，绅商在参与新学者的人均频次为 0.6，仅为平均数（1.3）的 1/2 弱。由上推知，绅商在地方新学教育体系中占据着相对顶端的位置，扮演着创办新学的主导性角色，而这个体系的顶端以下部分则由为数众多的参与者组成，其活跃程度依次是少数具有贡生及以上高级功名者、众多秀才以及为数更多的不具功名者。也正是以绅商为枢纽，形成了士绅、商人和知识分

子等各阶层在地方学务上的合作关系，又依托其社会关系网络，吸引了诸如蔡元培、汤寿潜、蒋智由、徐自华、叶翰、邵力子、杜亚泉等一批近代教育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参与，进而使南浔地方学务的影响力散逸至全省乃至全国范围。

民元之后，在“官倡民办”模式式微以及“官办民助”与“民间自办”模式互为补充的新学格局下，绅商愈益占据地方学务的中心位置，成为地方自治范畴下地方学务的主角。与此同时，随着1905年科举考试以及1911年“科名奖励”制度的停废，一批接受新式中等或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相继进入地方教育领域，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悄然提速。我们以地方学务亲历者——拥有旧功名的绅商与士绅、拥有新学历的新知识分子——作为参照，根据这两类群体的比重，抑或两个群体拥有新旧文化资本的结构强弱来构建一个连续谱：从连续谱的起始端（即传统旧功名等旧文化资本与地方教育的结合）到终末端（即新学历等新文化资本与地方教育的结合）的位置移动，既是地方教育、也是地方学务亲历者的近代化过程。1920年代，南浔地方学务亲历者快速地完成了一个由旧而新的转换过程：相较于表1所示的地方学务亲历者中72.3%的人具有秀才及以上功名，前述私立南浔中学成立初五年（1925-1930）的25名教员中，除了1人为前清秀才、3人教育背景不详以外，其余21人中：4人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17人均均为上海南洋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苏州农校、中山体专等近代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生。^⑨这种情形并非“民间自办”私立学堂所独有。1931年的社会调查显示：当时南浔镇28所小学（包括“官办民助”和“民间自办”两类学校）的87位教员中，有大学教育科毕业生1人、大学非教育科毕业生2人、旧制师范或高中师范毕业生14人、短期师范训练班毕业生5人、初中毕业生40人、专科职业学校毕业生18人、非学校毕业生7人。具有新学学历的教员占比达到了92.0%。^⑩上述中小学教员教育背景的集体性转换，标志着教育近代化的全新支配结构的形成。

新学教育支配结构的形成，离不开绅商阶层的拱托。以新学历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私立南浔中学（1925-1937）为例，其创办人沈石麒、沈调民、周心远均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校生，于上海“五卅惨案”后肄业回乡办学，以遂教育救国之志。三人多方“聘请校董及募捐”经费，推举周柏年（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为发起人，并得到了张静江、庞莱臣、周庆云等绅商的支持。^⑪中学最初实行校长负责制，1927年改行董事会制，聘请张静江、庞赞臣、周柏年、周庆云、张君谋、周佩箴、张芹伯、张赓虞、刘承槭、周心远、张剑鸣、沈调民、沈石麒等13人为第一届校董，推选张静江为董事长，庞赞臣为副董事长。^⑫董事会下设校务委员会，由庞赞臣、张仲凯、张赓虞、刘承槭、周心远、张汉衡、沈调民、沈石麒、李庆升、邱调梅、钱岂凡等11人组成，作为审议、管理和监督学校行政工作的专门机构，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近代私立学校组织管理制度。^⑬据现存资料：董事会中除周心远、张剑鸣等2人信息不详外，张静江、庞赞臣、周柏年等8人均均为绅商，沈石麒、刘承槭、沈调民等3人为绅商家庭出身，后者两者占比为84.6%。校务委员会中有绅商以及绅商家庭出身者6人占比为54.5%，其核心成员中，“有钱”的沈石麒出身“沈鉴记”丝行，为南浔“四象”之庞氏女婿，于1925-1929年、1932-1937年两度担任校长；“有势”的刘承槭出身南浔“四象”之刘氏家族，于1929-1932年出任校长，其父刘安仁（字颂骥）为南浔商会会长；“博学多才”的沈调民出身“沈永昌”丝行，于1925-1927年、1929-1930年两度担任教务主任。^⑭

上述董事会、校务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背景、教育经历、社会关系虽然各不相同，但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和文化阶层来说则有着鲜明的共性：他们或者身为绅商，或者出身绅商家族，拥有传统功名或新式学历，集聚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源于一身，又延续了传统家国情怀中的乡土文化认同和教育救国热忱。在他们的推动下，私立南浔中学获得了优厚的资源，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先后得到了来自地方各界、南浔公会资助，购置土地，新建校区；破除保守势力阻扰，借占报国寺，扩建校舍、食堂；整合地方教育资源，合并精勤学塾、私立南林初级中学、儒葵会国民学校，增设附属小学、增扩年级、班级；根据乡镇特点和社会需求，创设农场，发展生产教育。^⑮中学规模也从建校之初的3个年级、6位教师和21名学生发展到1930年的5个年级、15位教师和145名学生。^⑯倚靠绅商阶层的拱托，一群具备新式学历、新知识结构、新教育理念的近代知识分子集聚于南浔中学，形成了一个新“学绅”群体，带动了整个地方教育体制、目标和方式的近代化改革。^⑰私立南浔中学的发展轨迹印证：在地方教育近代化的转型中，虽然绅商与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文化资本等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但两者之间的通力合作以及后者顺利承接前者对地方教育结构的支配，是实现地方教育近代化、地方学务亲历者群体新旧嬗递的关键所在。

四、结语

台湾学者李国祁在考察 1895-1916 年浙江教育文化变迁时指出，促进清末民初浙江新式文教事业的创建与演进的“原动力”在于当时社会领导阶层——“因商致富的士绅”的自觉。由于与外人接触较多，他们在思想上较为开放，能接受新观念，再加上浙江文风鼎盛、素有捐资兴学传统，所以浙省新学的兴起较他省更为迅速普及。^①这里的“因商致富的士绅”即是绅商。晚清以降，面对近代社会遽变，江南市镇中的绅商阶层较早意识到近代新学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推动作用，他们率先响应清末教育新政，起而改造旧学、创办新学，在民元前后两个阶段、三种兴学模式中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活跃度，占据着地方新学教育体系的中心位置。他们维系了近代新学与经济资本、文化教育、思想启蒙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发生与发展，成为清末民初地方教育近代化的启动者和主导者，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成长为地方学务主体力量的助推者。

尽管个体的绅商投身地方教育近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多元复杂，其中既有谋取社会资本、攀援社会阶梯的现实考量，也不乏有“为青年谋幸福，为国家造人才”的理想感召，^②但就其整体的客观效果来说，新式学堂及其新学教育由此渗入市镇乡村，近代科学知识启蒙思想逐渐影响各个社会阶层。有统计表明，近代新学堂中传授儒家经典知识的比重由清末的 27.1% 降至民国初年的 8.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的比重同期则从 72.9% 增至 91.6%。^③这是知识结构上的变化，更为深远的变化则发生在思想与观念上。根据徐迟的回忆，1924 年秋，他在初小毕业后转入精勤学塾学习。这是一个大胆采用新学制、新教材和新方法的新学塾：国文老师王剑鸣教授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英文老师李庆升选用杰尔斯编写的《现代中国》教材，宣扬西方民主精神和三民主义，他知识渊博、逻辑完美、热情洋溢、外语流畅，是“镇上最有声望的人物，老一辈人不得不甘拜下风，年轻人认定他是好老师”；数理老师邱调梅主讲数学，同时“夹进了初等代数，两者齐头并进，还讲授一般的理化和生物的知识”。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名牌大学优等毕业生，已拿到了学士学位，有真才实学，而且他们都抱着一个回家乡办学的宏大志愿”。在学塾学习期间，徐迟逐渐感知到“国家大事还是很糟，外国侵略者野心很大，北洋政府极端腐败……”^④次年成立的私立南浔初级中学更是“生气勃勃”：“那些富商的孩子们，在外省大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介绍新鲜的一切保守人看不惯的事物进来，看不惯然而精神上又大受他们和新事物的威胁的，最后保守人不能不先行让步，容许他们的涌现”。这些年轻人介绍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民族、民权、民生等概念，“给地方人士教育了国家观念”，连“‘三从四德’的少女们心里也起了一点子波动”。^⑤

在新学教育的影响下，随着像徐迟一样的青年学生自我意识、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萌醒，传统社会世道人心、民风民俗也随之不变，近代民智由此开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浔求学沪、杭、宁等地者比比皆是，负笈海外者也日益见多。面对兴盛的新学，保守旧绅们喟叹“土风为之一变”；^⑥顽固派更是视新学教科书为“不经之书……邪言乱性流害”，对“青年男女咸染西洋之坏习气，所谓自由解放、不守规矩、不受父母约束、留意奢逸”而“深为世道人心忧虑”。^⑦只是，这种眷恋古往、拒斥革新的情绪无法阻拦教育近代化演进的历史车轮。

注释：

①田正平：《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教育科学规划回顾与展望——从“六五”到“十五”》，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0 页。

②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 317《礼部·学校·各省义学》，第 4029、4032 页；卷 318《礼部·风教·讲约一》，第 4047 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91 年版。

④民国《南浔志》卷二《公署》；卷三《学校》。

⑤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⑥徐有珂：《创建浔溪书院记》，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九《碑刻》四。

⑦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⑧《湖州城镇义塾总章程》，《申报》，1877年3月2日第3版。

⑨佚名：《南浔研究》，第36页，1932年。湖州档案馆藏，案卷号：313-7-20。

⑩“南浔中小学的学校数、学生数、教职员、教师资格待遇及学生年龄表”（1931年），前引佚名：《南浔研究》，第34页。

⑪《湖州府知府丁鹤年通禀》，民国《南浔志》卷二《公署》。

⑫周延初：《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1页。

⑬刘锦藻：《自编年谱》，第25页，南浔图书馆藏。

⑭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⑮前引周延初：《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第11页。

⑯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719页，中华书局，1958年。

⑰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⑱张廷华：《建筑高等小学校校舍募捐启》，周子美：《南浔镇志稿》，第510～512页，黄秀文、吴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稀见方志丛刊》第20分册（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⑲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⑳《学务处奏覆劝励绅商广设小学堂折》，《申报》，1905年10月29日第9版。

㉑刘伟：《官治与自治之间——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㉒邵祖德、张彬：《浙江教育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㉓前引周子美：《南浔镇志稿》，第505页。

㉔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前引周子美：《南浔镇志稿》第505～506、515～517页。

㉕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㉖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⑳ 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㉑ 《电请准拨封庵设学》，《申报》，1907 年 2 月 26 日第 10 版。

㉒ 周由廑：《我对于湖州学校之感想》，《湖州月刊》，1924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8～9 页。

㉓ 徐迟：《徐迟文集》，第九卷，《江南小镇》（上），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34 页。

㉔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61 页。

㉕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 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8 页。

㉖ 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一《人物》四。

㉗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 10 章，上海 1903 年版。

㉘ 謫者（演）：《记南浔庞氏开学堂事》，《杭州白话报》，1901 年第 14 期，第 2 页。

㉙ 林黎元：《南浔教育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州文史》第 5 辑，《教育医卫史料专辑》1987 年版，第 105 页。

㉚ 张乃燕：《先府君张公弁群行述》，陆剑、王巍立：《南浔近代人物碑传集》，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5 页。

㉛ 《上编+政事门：纪闻》，《广益丛报》（浙江），1905 年第 79 期，第 9 页；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㉜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65 页。

㉝ 前引周子美：《南浔镇志稿》，第 513 页。

㉞ 叶翰：《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 5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84～485 页。

㉟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书编：《蔡元培全集》第 6 卷，第 360 页；第 7 卷，第 169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㊱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 10 章，上海 1903 年版。

㊲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 21 期，1902 年 12 月 14 日；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选报》第 35 期，1902 年 11 月 20 日。

㊳ 林黎元：《南浔教育史略》，政协湖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州文史》第 5 辑，《教育医卫史料专辑》1987 年版，第 107 页。

㊴ 浙江省教育厅编：《浙江省教育法规汇编》，浙江省教育厅 1932 年版，第 152 页。

⑭参见前引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刘锦藻：《自编年谱》，第46、58页；周延初：《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第17页；林黎元：《南浔教育史略》，第105~111页；周子美：《南浔镇志稿》，第507~509页；湖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

⑮前引林黎元：《南浔教育史略》，第109页。

⑯《湖属六县自治状况》，《湖州月刊》（湖社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年第4卷，第5页。

⑰民国《南浔志》卷三《学校》。

⑱《湖属六县自治状况》，《湖州月刊》（湖社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年第4卷，第5页。

⑲王维三：《忆抗战前的南浔中学》，《南浔通讯》1994年9月28日第3版；前引林黎元：《南浔教育史略》，第115~118页。

⑳前引佚名：《南浔研究》，第34页。

㉑刘承干：《求恕斋日记》，第八册，第30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

㉒《浔中初建期校董会组成与校长更迭》，《南浔通讯》1995年6月10日第4版。

㉓林黎元：《南浔史略初稿》卷五，第九章，第15页，1982年，南浔图书馆藏（NX303653）。

㉔前引徐迟：《徐迟文集》，第九卷，《江南小镇》（上），第47页。

㉕参见前引刘锦藻《自编年谱》，第58页；徐迟：《徐迟文集》，第九卷，《江南小镇》（上），第45~47页。林黎元：《南浔教育史略》，第118页。

㉖前引佚名：《南浔研究》，第34页。

㉗有关南浔中学在近代化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组织等方面的特色，参见《浔中半月刊》，1935年1月1日，第6~9页；3月18日，第2页；4月3日，第21页。南浔中学校史馆藏。

㉘李国祁：《清末民初浙江地区近代化演进过程中的教育与文化事来（1895-1916）》，《中华学报》（台北），民国六十五年（1976）第3卷，第2期，第151~152页。

㉙周由廑：《我对于湖州学校之感想》，《湖州月刊》1924年第1卷第1期，第7页。

㉚袁立春：《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㉛前引徐迟：《徐迟文集》，第九卷，《江南小镇》（上），第42~43页。

㉜前引徐迟：《徐迟文集》，第二卷，《一个镇的轮廓》，第47、161~163页。

⑥ 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三《风俗》。

⑦ 前引刘承干：《求恕斋日记》，第三册第 382 页，第八册第 184 页。